

·修·辞·学·丛·书·



外国现代修辞学 概 况

福建人民出版社

华东修辞学会编

修 辞 学 丛 书

华 东 修 辞 学 会 编

外 国 现 代 修 辞 学 概 况

编著者：王德春（主编）

谢天蔚 杨金华 郑振贤 顾田国

张会森 杨天雨 蔡幼生 李永芳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

修辞学丛书

王德春(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4.875印张 104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190

书号: 7173·824 定价: 0.83元

修 辞 学 丛 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王德春

顾问 倪宝元

常务编委 袁 晖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安龙 王德春 卢起和

朱泳焱 林承璋 倪宝元

袁 晖 梁 超 谭永祥

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修辞科学，普及修辞知识，促进修辞教学，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辑了一套修辞学丛书，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包括修辞学的一般理论、辞格、语体、风格、篇章、词句表达、作家作品的语言研究、国外修辞学的评介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各册在内容上有所侧重，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但也注意必要的照应和联系。

这套丛书以普及修辞知识为主，也反映作者新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既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语言的运用；又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有所创新。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的热情指导和广大作者的积极支持，我们特表示衷心感谢。但是，由于我们编辑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修辞学丛书，还缺乏经验，其中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论述了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趋势，简要地介绍了英国、美国、苏联、法国、德国等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修辞学研究情况，给我国修辞工作者和修辞爱好者提供一点参考材料。这本书主要由上海外国语学院语言学教研室教师编著，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上海海运学院几位外语教师也参加了编写工作。各章执

笔者：第一章《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王德春；第二章《英美现代修辞学》，顾曰国；第三章《苏联现代修辞学》，谢天蔚、张会森；第四章《法国现代修辞学》，杨金华、杨天雨；第五章《德国现代修辞学》，郑振贤、蔡幼生。统稿者：王德春、李永芳。主编：王德春。

目 录

一、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1)
(一) 语言研究和修辞学.....	(1)
(二) 言语研究和修辞学.....	(9)
(三) 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	(26)
二、英美现代修辞学概况.....	(33)
(一) 概述.....	(33)
(二) 实践修辞学.....	(38)
(三) 论辩修辞学.....	(42)
(四) 小说修辞学.....	(46)
(五) 语体学.....	(50)
(六) 文学作品语言风格学.....	(59)
(七) 论隐喻.....	(68)
三、苏联现代修辞学概况.....	(74)
(一) 俄语修辞学研究简史.....	(74)
(二) 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	(76)
(三) 语言修辞学.....	(79)
(四) 功能修辞学.....	(84)
(五) 话语修辞学.....	(88)
四、法国现代修辞学概况.....	(94)
(一) 历史的回顾.....	(94)
(二) 表达修辞学.....	(98)
(三) 发生修辞学.....	(109)
(四) 功能修辞学.....	(115)

(五) 结构修辞学.....	(120)
五、现代德语修辞学概况.....	(128)
(一) 修辞学的对象和任务.....	(128)
(二) 修辞学历史的回顾.....	(131)
(三) 功能修辞理论.....	(133)
(四) 结构修辞理论.....	(137)
(五) 心理解释修辞理论.....	(138)
(六) 描写语言修辞理论.....	(140)
(七) 数理修辞理论.....	(141)
(八) 综合修辞理论.....	(141)
(九) 修辞学与语言学其他分科的关系.....	(142)
后记.....	(147)

一、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趋势

(一) 语言研究和修辞学

1. 另辟蹊径，势在必行

传统修辞学不区分语言和言语，往往将语言体系的修辞分化赋予话语，又把话语的修辞效果仅仅归功于修辞手段。它主要以文学作品语言为研究对象，从而失去了人类言语交际广泛的源泉。它在理论上受到局限，实践上偏于一隅。另辟蹊径，势在必行。

2. 索绪尔和巴利的贡献

本世纪初，著名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了区别语言和言语的理论。他的学说，为现代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对现代修辞学起了启迪作用。

但是，索绪尔在划分语言和言语之后，只把语言体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使语言学的研究重点较长时间停留在语言的结构体系上，忽视了对言语的研究。这又对修辞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使修辞学比起音位学和语法学来，显得比较落后。不过，语言学界从索绪尔的划分中得到了启示，先后向言语这一广阔领域进军。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信息理论的发展，言语被看作语言学的重要对象，从而使主要研究言语规律的修辞学获得了很大发展。

索绪尔的学生、语言学家巴利，首先把区分语言和言语

的观点带进了修辞学，揭开了现代修辞学新的一页。巴利研究了语言和言语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法语词汇进行了大量研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词汇同义表达手段体系，进而确认并强调了语言不仅是一个交际的符号体系，而且是一个表达感情的体系。语言单位不仅表示理性意义，还可表示感情色彩。也就是说，语言单位可以产生修辞变体，表达感情内容，取得相应的修辞效果。所以，巴利认为，修辞学的任务正是描写语言体系中的修辞色彩的变体。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体系的各种要素的表现力问题，以及构成某一语言表现手段体系的各种言语事实的相互作用问题”。巴利正确地把语言体系的修辞色彩同言语修辞效果区别开来，而他重点研究的却是语言体系中的修辞变体、语言的感情色彩、语言词汇单位和语法单位的修辞意义等，而不是人们在言语环境中使用语言的状况。这种研究语言体系表达手段的修辞学称为表达修辞学。

巴利指出，语言体系中存在两种修辞效果，一种是自然效果，另一种是联想效果。

自然效果是语言单位产生的效果。一定的思想内容与其表达的语言形式之间存在适应性，即存在自然联系，由这种自然联系所产生的效果便是自然效果。联想效果是指一定的语言形式在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使用环境的联系中所产生的效果，语言单位的表达手段都可以系统地体现这两种效果，或者说，都可以围绕这两种效果而分析出一定的表达系统。这就是表达修辞学的体系框架。

自然效果大多与语音的性质、词的结构规律、语法体系的特点有关。语义内容在其与语音因素、形态因素、以及结构因素的配合中显示出修辞价值。有些词的意义联系、词的

构造、词义的形成是有理据的，因而词的理据性常常成为表达效果的依据。从语音方面说，各种语音成分，如重音、叠音、长音、语调等等在其与一定的意义的联系中均可构成表达手段，取得自然效果。汉语中词的叠音后缀带有很强烈的描绘色彩和形象色彩，如“绿油油，亮闪闪”。从词汇方面说，词的构成、词义的形成均可取得广泛的自然效果。在汉语里，“儿”这个后缀常常带上喜爱等感情色彩，如“小鸡儿”、“红花儿”。而由“棍”、“蛋”等表示事物的词素构成的表示“人”的复合词则含有贬义，如“学棍”、“党棍”、“坏蛋”、“笨蛋”。此外，象汉语的“雀跃”等词的表达效果则来自语义理解。从语法方面说，时态、句式、语序等语法范畴也都可提供修辞变体。如汉语的“把”字句有较强的“处置”意味。

联想效果与语言形式的使用环境有关。每一个词，每一个结构都属于一定的语言区域，属于一定的语言状态。语言受阶层、职业、体裁、口吻的影响而分化，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变体，由此产生各种形象的、表示不同态度、感情的色彩，从而导致不同的修辞效果。语音中的音位变体一般会产生“阶层性”或“地域性”等联想效果。说汉语时，名词的“儿化”，或者强调 eng、ing 这些韵母中的鼻尾韵，就可产生“北方人”这种联想效果。而语调变体则更侧重表达各种不同的感情和态度；词汇表达的联想效果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词义的变化是词义获得表现力的重要来源。汉语中的“帽子”一词，在五十年代获得了“政治罪名”或“坏名义”的意义。这些变化的词义都可增强词的表现力，产生联想效果。联想效果有其相对性，一定要在与之对立的环境中方能产生。某个阶层经常使用的

词语的联想效果只有到另一环境中才能显示出来。例如工人宿舍或兵营中的一个中性词语，用在客厅中则使人感到格格不入，产生相应的联想效果。同理，十六世纪的新词语只有到现在才带有古风，显示出修辞价值。如果现在仍旧用“吉卜赛人”表示“骗子”等意义，则使人联想到狭隘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感情。语法方面亦然。例如，汉语中的倒装句式“我明天来看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之类，在一般场合使用就有“外交的”、“做作的”、“文雅的”意味。

表达修辞学细致地解剖了语言结构的各个平面，建立了语言结构各个平面产生修辞效果的表达规则体系，其中词汇表达方面获得的成就较大。表达修辞学开创了语言修辞学新的研究方法。

3. 欧美结构语言学和修辞学

欧洲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继承并发展了索绪尔的思想，它在语言结构体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当代工程语言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区分体系和话语、能力和行为、代码和信息等概念，这实际上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出语言同言语的区别问题。从修辞学方面看，就是确认了语言体系的修辞功能与意义效果的区别。这正是巴利的观点。巴利注重的是语言材料本身的变体体系，结构语言学则主张把它们放到语言的结构中去考察。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布拉格学派从功能的观点补充了巴利的“风格变体”的概念，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话语之外无所谓风格；第二，修辞效果不取决于语言单位本身，而取决于它们的关系。比方说，单个的古语词并不能说明它具有什么风格，而这个古语词的修辞效果只有在它与现代语词的关系中才能显现出来，并使话语带上风格特征。显然，他

们更加明确地把语言体系中的修辞色彩同言语中的修辞效果区别开来。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一个语言单位的修辞价值依赖于它在结构中的位置。结构有两种，一种是语言体系的聚合结构，一种是话语的组合结构。在体系结构中表现出语言单位的功能，在话语结构中才表现出语言单位的修辞效果。这种研究语言结构关系体系的修辞学叫结构修辞学。

侨居美国的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雅科布逊提出“等价原则从选择轴投影到组合轴”。这就是说，从语言聚合体系中选择带有修辞色彩或语体色彩的语言单位固然是构成话语修辞特点的基础，但这些单位在话语中的组合才真正体现出修辞效果。而大量中性语言单位和带修辞色彩的语言单位的相互组合关系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揭示各语体的修辞特点。在语言体系中性质上等价的语言单位要放在话语组合中的等价位置上，才能产生修辞效果。因而，修辞效果不仅依赖于语言单位的性质，更依赖于话语的组合。雅科布逊的研究说明，语言单位的功能和价值是由语言体系的聚合结构决定的，而语言单位的意义效果则表现在话语的组合结构上。例如，我们常提到的王安石的诗中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其中“绿”这个词是从“入、到、满、过”等词里选择出来的。它们在词汇体系中都是中性词，然而，当“绿”放到这句话的谓语的位置上，同主语（春风）、宾语（江南岸）形成一定的组合关系时，却表现了独到的形象色彩，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也只有当“入、到、满、过、绿”等同时放在这句话的谓语这个等价位置上时，才能衡量出它们的修辞价值，比较出修辞效果的高低，从而决定取舍。所以，雅科布逊认为聚合和组合这两种结构的结合才是话语修

辞效果的基础，只有这两方面的结合才能起到有效的传递社会信息的作用。

雅科布逊的这一思想，也被美国语言学家莱文用在诗歌研究上。他们都认为，诗歌的功能，是在语言体系中选择相应的等价语言单位放进话语组合结构的等价位置上，性质等价和位置等价相结合就产生修辞效果。例如，在写诗时，总是在语言体系中选择语音和语义性质适应的等价词放到诗行末尾这个话语组合的位置上，成为位置上的等价，形成押韵。这种恰当的选择和恰当的组合，就显示出强烈的修辞效果。语言单位的全部意义价值蕴藏在语言体系中，言语组合使某一意义价值体现出来，产生某种实际意义，显示出修辞价值。

4. 转换生成语言学和修辞学

乔姆斯基作为转换生成语言学派的代表，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但他研究的重点是语言能力，不重视语言行为的研究。这是由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都主张从语言事实建立精密的形式化规律；凡不利于形式化和精密化的现象，都被排斥在研究之外。正是修辞学动摇了这个基础，使语言学把言语作为观察和研究的领域。转换生成语法后来不仅强调“符合语法”这个要求，同时提出了“可接受”以及“适当”等要求，这说明已有克服语法体系严格公式化的试图，开始考虑到语义，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修辞，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如上面所阐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一系列关系的体系，认为语言的运用是以这些结构关系为依据的，因而在研究修辞现象的时候并不完全排斥形式分析，修辞现象的形式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有些修辞事实可表现为概括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模式化。如修辞方法分类，语体的体系化等问题都可以在某种

程度上加以形式化。运用数学统计学的结果，为研究和探索修辞规律的程式化开拓了新的前景。当然，修辞规律形式化的程度是极其有限的。许多修辞现象不容易形式化，如话语的言外之意，语言的模糊性，感情色彩以及比句子更大的话语本身，都很难加以形式化。

结构修辞学区分了语言体系中的修辞色彩同言语中的修辞效果。但它把语言单位的修辞分化仅仅理解为结构关系的体系，而没有说明它们是来自言语中对规范用法的偏离。所以它的研究仍属于语言修辞学。不过，话语组合结构并不能脱离话语本身，所以，结构修辞学的研究已经从语言领域开始进入言语领域。

5. 吉罗和法国结构修辞学

六十年代，法国的结构修辞学也采用了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与方法，完成了自己的体系。法国语言学家吉罗是一位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吉罗认为，纪尧姆提到的能力与行为、代码与信息，意义与意义实效等几种对立的双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些对立关系实际上来源于语言结构体系以及语言运用的区别和联系。吉罗认为，这个区别和联系是奠基性的，是修辞研究的必要前提。他依据“意义和意义实效”这一对应关系，从语言单位的形式和功能出发来探讨风格的成因。

所谓“意义和意义实效”就是指在语言和言语的关系中，“意义”是语言对言语制约的“潜能”，是语言单位可能承担的信息的总和；“实效”是指说话人组成话语时对其中某一信息进行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话人取得的传达实际信息的形式。例如“红”这个词，可以指与此概念有关的各种实际意义，组成话语时，只能联系其中某一特定的具体情

况，完成实际表达，取得实效。红花，指花的颜色，红得发紫，指走运；又红又专，指积极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意义是符号在语言体系中的潜在价值，意义实效是符号在话语中所表达的具体意义。

据此，吉罗提出了词的意义与用法的对立。词义有两个基本特性：结构特性和潜在特性。结构特性是说词的价值要根据它在语言体系中与其他词的关系来确定；潜在特性是说词具有若干个价值，但只有一个价值能在特定语境中显示出来。前者是指词的聚合特性，后者是指词的组合特性。词义价值存在于聚合结构之中，而意义实效则来自词的组合关系。据此，吉罗认为，符号的潜在价值之所以成为意义实效，是由语言结构(聚合结构)过渡到语言运用(组合结构)的结果。

吉罗认为，风格来自对语言规范的偏离，规范和偏离可以将使用频率作为依据。使用频率高的常用方式可称为规范，而使用频率低的罕用方式就是对规范的偏离。这种偏离同样可以表现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平面上。

在汉语中，某些修辞手段，如比喻、借代、比拟等等，可使一些语法和语义上不通的搭配变成可接受的。例如：“诗句，是钟情的”（比拟），“诗，思索之树结下的金果！”（比喻）这种非常规的搭配便是对规范的偏离。苏轼曾说，“好事以反常合道为趣”，这与吉罗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吉罗兼顾语言结构与语言运用，认为修辞效果固然是就话语而言的，并且只体现在话语之中，但修辞效果不能离开修辞价值，而修辞价值的根源则在于语言体系。因此，修辞效果一方面依赖于话语的结构，另一方面又依赖于语言体系的结构。修辞研究既要着眼于作家如何组织话

语，也不能忽视语言体系。

由于法国结构修辞学，兼顾语言和言语两个方面，并注意语言运用对规范的偏离，使修辞学研究更加接近言语领域。

（二）言语研究和修辞学

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它具有工具的一般特点和结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研究语言的结构体系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交际工具，语言具有社会功能。它的使用必然要联系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刀具是一种切削工具，但是再“利”的剪刀都不能切削金属，再好的车刀也不能用来裁剪衣服。我们必须了解各类切削对象的特性，才能更好地使用各种刀具而“善其事”。索绪尔的学生、法国社会学派语言学家梅耶就注意了被索绪尔指明但又未予研究的语言所服务的对象：社会。他考虑了语言的社会本质，对语言的社会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的发展引起了语言的变化。就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内部，布拉格功能学派也把语言看作是完成社会任务的交际工具。在他们后期的著作中，指出了语言演化要受社会演化的制约。至于伦敦功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更是把语言当作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苏联语言学界从二十年代起就注意研究十月革命后的语言变化，研究多民族国家双语现象的各种特性。美国人类语言学家也研究了各民族语言和人种的相互关系。总之，当语言研究联系到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时候，语言体系的发展变化就找到了可靠的依据，而语言的使用也有了合理的指导，这对修辞学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发